

·上·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

王永生 主編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

上 册

主 编

王 永 生

编 写 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道明 沙似鹏 张 新 贾鸿猷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彭鹤松
熊冬华
封面设计 邹刚
封面题字 宋吟可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

王永生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南充日报社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5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书号 10115·628 定价 3.3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五四运动至建国以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学术著作。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它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后文学理论批评获得迅猛发展的情况略而不论的局面,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段重要空白。它对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吸取历史教训,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更好地开展文学评论,也具有重要意义。编写者们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见解新颖,立论公允,要言不烦,文字浅显,适合广大文艺爱好者、理论工作者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阅读。

上册各部分执笔分工

引 言、第三章	王永生执笔
第一章、第二章	沙似鹏执笔
第四章、第五章	张 新执笔
第六章、第八章	贾鸿猷执笔
第七章、第九章	许道明执笔

引 言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以“五四”至建国以前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情况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创建的、研究先秦至“五四”前夕文学理论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相衔接，共同完成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的建设。

自从有了文学现象，就有对于文学现象发表各种看法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一些诗就说到了作者写诗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地述及诗歌的社会作用，可以看作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吴季札在鲁国观乐的那段议论，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季札对于《诗经》的评论，反映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对于诗乐的所谓“观风”的功利主义要求，表明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发展传统。学习与了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总结与汲取既往的经验教训，为发展与繁荣今后的文学事业，作出文学理论批评的应有贡献。

如同“前天”、“昨天”和“今天”、“明天”的密切关系一样，为了今天和明天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更加蓬勃地发展，我们应该系统地回顾先秦以来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漫长历史，

总结其带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汲取其可取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文艺工作者还需以很大的精力，继续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然而，正如“前天”与“昨天”同今天的密切关系还不尽等同的道理相似，对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获得迅猛发展，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文学理论批评，相对来说，却更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地进行认真回顾，作深入细致的经验总结。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伟大的开端。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许多有益成份，也利用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中长期积累的可取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它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下，一开始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发表文学革命主张，提出战斗口号，向封建旧文学猛烈攻击，催促与鼓舞了新文学创作的诞生与萌发，成为服务于当时反帝反封建革命总任务的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一翼。

早在十九世纪末叶，我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就日趋高涨。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梁启超等竭力推行“新文体”，黄遵宪则提出了“吾手写吾口”，要求摆脱旧诗格律的束缚。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无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文中更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教育作用，使小说的地位获得提高，使一些宣传新思想、暴露旧世态的小说获得了发展。辛亥革命前夕，随着“文明新戏”的兴起，以及围绕“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又为输入话剧、改革旧戏而涌现了一批戏剧改良言论。近代文学批评的这些新的

因素的出现，为新文学的产生作了若干准备，但上述文学革新主张都未曾引起广泛的讨论，造成较大的声势，同时也因时代条件不够成熟，反对封建旧文学的要求很不彻底，一些积极主张改良的代表人物，虽多数提倡白话，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仍大都未能改变古汉语为主的实际状况，至于对帝国主义更缺乏本质的认识，在文学改良的上述一系列主张中，尚未能反映这方面的革命要求。

“五四”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展开，历史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新青年》及稍后出版的《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等为主要阵地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连续发表了宣传新思想，鼓吹文学革命主张的重要文章，首先高举了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旗帜。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周作人《人的文学》等文先后发表，具体阐述了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内容。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正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败、“劳工主义”必胜的发展趋势，并满怀激情地向我国人民阐述了十月革命的巨大胜利以及“走俄国人的路”的重大意义。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等等，也团结和影响了一部分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共产党人邓中

夏、萧楚女、瞿秋白、沈泽民等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艺术与生活》、《荒漠里》、《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著名文章中，也相继积极宣传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推动了新诗、新小说、新剧等文学革命创作实绩的涌现，也促使有关文体的文学批评活动的开展与有关理论课题的探讨。

在诗歌领域，胡适《谈新诗》以及就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两诗集所作的评论，宗白华《新诗略谈》、康白情《新诗底我见》、周作人《论小诗》以及围绕胡适《尝试集》与郭沫若《女神》，乃至稍后就汪静之《蕙的风》所开展的诗歌评论，分别具体阐述了新诗从内容到形式诸要素进行重大变革的各种主张，探讨了新诗发展中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其中周作人等关于日本俳句小诗与泰戈尔诗作的介绍，郭沫若、宗白华、田汉共同探讨新诗问题的《三叶集》、闻一多等人关于新格律诗的探索，李金发、穆木天、梁宗岱等人关于象征主义诗歌的引进、倡导等等，都是“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

在小说领域，全新的文学批评也纷纷涌现。传统的小说批评主要是评点式的，如李贽、金圣叹关于《水浒》的评点等等，近代虽有了《小说杂考》、《孽海花考证》等考证式评论，以及《〈官场现形记〉叙》等序跋一类评论，稍后梁启超等人在《新小说》上还曾发表了《小说丛话》等形式较为新颖的小说评论文字，但这些小说评论基本上仍未脱评点小说章法与诠释作品的窠臼。随着“五四”前夕开始的对“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评、清算，在《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创造季刊》上先后出现的小说评论，大都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探讨小说应有的社会意义，以及小说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技法的革新，有的还就小说的艺术特点对作品作了简要的评析。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围绕鲁迅《呐喊》、郁达夫《沉沦》、叶绍钧《隔膜》、

徐玉诺《到何处去》的评论，以及对冰心、卢隐的对比评议等等。在这期间关于小说批评工作成绩卓著的首推茅盾。他在我国开创了就一个时期小说创作倾向进行综合述评的评论，如《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这些文字体现了“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理论成就。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开辟了《自己的园地》，成为我国最早的专栏评论家。《小说月报》自茅盾主持编务后，更在第十二、十三卷中专设了“创作讨论”、“创作批评”栏目，对小说创作较广泛地发表读者的评论、反映。

在戏剧文学领域，由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在中国的介绍，逐步引向了关于旧剧存废之争的讨论，以及关于“文明新戏”走向没落的根由探究，进而对陈大悲提倡的“爱美的”戏剧及与此相对峙的“职业的”戏剧的讨论，至此，“为人生”的戏剧主张受到了新剧界的普遍重视。稍后又展开了对余上沅、赵太侗倡导的关于“国剧运动”的理论探讨与评论活动。在上述戏剧文学评论中，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等先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对戏剧改革与新剧适应时代前进步伐涌现新的剧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思想斗争方面，早在“五四”初期就在同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进行了交锋；稍后，又同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编撰的《学衡》杂志以及在章士钊等主持下复刊的《甲寅》作为主要阵地的封建复古势力作了反复较量。这些南北呼应的复古派代表人物，以“学贯中西”为标榜，摆出一副“仗义执言”的姿态，叫嚷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连篇累牍地在《评提倡新文化者》、《论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中，对白话文、白话新诗大肆攻击，并公然提出取消“白话文学”的荒谬主张。“现代评论派”文人陈西莹甚至说什么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版的作品“还不如英人一季出的书”，在文化上

“三等国的头衔我们已经受之有愧”（《西滢闲话》）等等。封建复古主义的这些言论刚一露头，立即遭到鲁迅、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驳斥。在“五四”初期曾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新文化运动，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胡适，在二十年代初便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倒向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阵营。这时对于胡适以及“现代评论”派买办文人所开展的批判斗争，以及对于维护封建旧文学、鼓吹“读书救国”“本位主义”和一部分“鸩鴛蝴蝶派”文人所展开的批评，又成为文学战线两种文学思想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与搏斗的焦点。

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文学阵营，同形形色色的复古逆流及其它错误思想所进行的激烈交锋，既批判了各种错误言论，澄清了理论思想是非，为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扫清了道路，又在实际文艺思想斗争中提高了进步文学批评队伍的理论水平与战斗能力。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斗争中发挥了作为英勇旗手的巨大作用。早在“五四”前夕，鲁迅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随感录”，高举反封建大旗，对于阻碍文化革命洪流前进的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嗣后，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在对封建复古派所作的清算中，以及对于“现代评论”派买办文人所开展的思想批判中，鲁迅都冲锋陷阵，积极影响与带动了一大批进步文化战士，坚持有理有力、克敌制胜的战斗。茅盾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以强烈的政治敏感与高度的理论识见所写作的一系列文学批判文字，对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错误言论作了有力的清算。成仿吾在“五四”时期也是较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所撰写的《新文学之使命》、《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也曾为新文化运动的鸣锣开道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在宣传文学革命主张，扶植新文学创作的茁壮成长、抗击和批判各种反动文艺逆流与错误文艺思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但“五四”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也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的方面。

首先，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兴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本身便是中国二十世纪初叶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反映。正象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一样，评论者队伍的构成也异常复杂。参与文学批评工作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后，虽然热烈响往社会主义，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汲取我国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中进步的有用的成份，为使我国新文学赶上新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多方探求。但限于传播者当时思想认识水平与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深入程度，在积极鼓吹文学革命、捍卫广大劳动人民利益而写作各种类型的文学评论时，不免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特点，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与绝对化倾向。对于某些否定文学革命的错误言论，批判时据理分析尚不够透辟，尤其是对产生某种谬见的社会根源与个人思想根源，往往未能着重剖析。

“五四”时期进步文艺工作者们对于国外文艺思潮、创作方法等等，作了大量的介绍、引进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对某些文艺思潮、创作方法进行介绍、引进时，尚不免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搬硬套情况。比如关于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的界限，在早期便有某些混同理解的现象；对于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一些人在当时认识尚欠全面，缺乏有分析地吸取。甚至国外的一些颓废派艺术，也曾被个别文艺社团与作家无批判地作肯定介绍。

此外，“五四”时期文学批评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评析时，还

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缺憾。一些评论文章往往仅就作品某些局部的问题逐一评点，只有少数论者能就作家的思想与作品的表现联系起来作通盘的评析。有的评论家往往单纯就道德的角度议论作品的是非，而其道德观又往往陈旧、不合时代潮流。比如某些人对汪静之《蕙的风》、郁达夫《沉沦》的指责便是典型事例。有的论者则注意作品的政治倾向性较多，往往只侧重就文艺的社会功利方面论析作品的成败，而不同程度地忽视对作品的艺术特色，对作家的艺术个性进行探讨与评析。

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农村武装割据、实行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文艺领域内，由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不断增长，一九二九年前后，出现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热潮。一九三〇年，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结束了革命文艺队伍中因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并摆脱了某些人的宗派情绪与门户之见。

早在一九二八年初，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期刊上就正式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一九二三年郭沫若以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引向深入，力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事业联系起来，以适应当时我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形势。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以及冯乃超、钱杏邨、阳翰笙等人，都先后发表了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主张。他们鼓吹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群众的斗争中发挥战

斗作用。他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种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进行一番改革，应该歌颂新人物，反映新生活，从而才能使文学“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欢爱”。他们强调革命作家应当掌握先进的世界观，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特有的劣根性”，“获得真正普列塔利的意识”，才能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一批年轻的革命文艺战士们在一九二八年就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所发表的上述言论，将这以前对革命文学问题的理解引向了深入，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年轻文艺战士们有感于急剧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要求文艺更好地适应时代与革命阶级的需要发生巨大的变革，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摆脱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自觉地把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同无产阶级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然而由于倡导者们多数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转化过程中，一时还不能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要领，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还缺乏深刻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也欠准确、精当，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成败得失缺乏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估价，忽视了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同“五四”文学传统中早已萌发的革命文学因素的有机联系，因而在宣扬一系列可取的革命文学主张时，便在不同程度上夸大了文艺的社会作用。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的界限，将资产阶级中具有爱国民主倾向的进步分子，以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激进派一律视为革命对象，甚至对我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也乱加斥责，采取了粗暴的谩骂与攻击、排斥的态度，分明超出了革命队伍内部文艺论争中相互尊重、共同探讨文艺问题的范围，表现出种种小资产阶级文人的恶习。

革命文学倡导中所出现的上述种种不良倾向，以及这一时期倡导者言论中某些偏颇，当即引起鲁迅、茅盾以及一大批革命文

艺战士的不满。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下已初步实现世界观的飞跃的鲁迅，这时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以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襟怀坦然对待来自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某些人的漫骂诽谤，尽管在同友人的通信中流露了对有关倡导者“拼命攻击”的不满，但在大量的答辨性评论文字中，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一些事关重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将无谓纠葛引向健康的论争轨道，使革命文学的倡导与理论探索，取得了更多的积极成果。他不仅有理有力地批评了革命文艺队伍中上述某些人的错误，而且尊重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革命作家统一组织的意见，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总结了革命文学某些倡导者应吸取的教训，申述了左联的战斗纲领，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左翼进步作家应坚持的生活道路与应注意的思想修养，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与理论威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左联”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积极组织力量翻译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版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五封重要信件与列宁论托尔斯泰等重要论文在内的一系列马列文艺论著，以及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拉法格、梅林、高尔基的重要文艺论著，撰写、发表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在内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文字，对于加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理论武装发挥了无法估量的重要影响。“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还以“中国无产阶级作品及理论的发展之检讨”、“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检讨”等课题，作为研究会的主要工作内容，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

三十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以后的第一批作品陆续

出现。在获得最初的可喜成绩的同时，作家思想意识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弱点也在有关作品中有所暴露。左翼文艺战士既充分肯定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新题材、新主题的重大意义，肯定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与上层社会腐败进行抨击、鞭挞的巨大社会功绩，与此同时也对它们的某些缺憾与不足之处，比如未能揭示革命前途，对现实生活中的革命主流反映不力，作品基调较为低沉，以及忽视艺术表现手腕等等，提出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一九三〇年五月，阳翰笙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一文中对蒋光慈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丽莎的哀怨》所提出的批评，一九三二年七月，瞿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邨在阳翰笙的小说集《地泉》重版时所分别写作的“序言”，便反映了左翼文学批评的这一基本面貌。

阳翰笙的小说集《地泉》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作为“三部曲”类型的小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的初期单独出版时，都曾获得一定的好评。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文艺工作者们纷纷不满于以《地泉》为代表的这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因而包括作者本人所作自我批评在内，五位评论者同时写序对小说进行了重新评价。尽管瞿秋白、茅盾等人进行评论时，仍不免受苏联“拉普”的影响，依然强调作家要“运用那社会科学的要素——唯物辩证法，并且以这辩证法为工具，去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将认识现实的一般法则同形象地反映现实的艺术法则简单地混同视之，但毕竟已逐步认识到《地泉》一类曾获好评的革命文学早期成果，确实存在“脸谱主义”和“方程式”倾向，以致产生“没有深切地感人的力量”的弊端。瞿秋白、茅盾等人在有关《地泉》的序言中呼吁，作为“指导文坛的批评家”，决不应“推波助澜，增长这种倾向”，而应正视“文坛上还留遗着此种风气的余毒”。

茅盾的小说《蚀》与叶绍钧的小说《倪焕之》等以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为小说主人公，并以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展开关于时代和社会面貌描写的小说，也曾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引起不同的评价。茅盾的《读〈倪焕之〉》和《从牯岭到东京》，既反映了某些文艺工作者对于大革命失败而引起的消沉幻灭情绪，以及对投身新的战斗的渴求，也反映了某些作者对于小说创作题材、主题以及文学作品如何展现时代生活主流等文艺创作课题的思考和认识。茅盾对其创作小说《蚀》所作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于《倪焕之》所作的肯定评价，象鲁迅当年对其《阿Q正传》所持看法一样，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大力肯定了作家从实际生活出发，对于黑暗现实与特定社会背景下各色人等所受折磨进行淋漓揭示的必要性与严肃性，与此同时也表示了作家对展示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强烈向往。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左联”大众化研究会还组织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真讨论。鲁迅、瞿秋白、周扬、夏衍等积极撰文，不仅使左翼作家在认识上对文艺“面向群众”问题大大提高一步，而且在创造最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的大众化文艺形式方面，付诸一定的实践，使一九三〇年春早就揭开序幕的这一场文艺问题讨论，不致停留于纯理论的切磋。一九三四年夏，讨论更就新旧文学形式的关系，如何对待旧形式、如何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从而对于革命作家在实际行动上正视并力图解决革命文艺脱离群众问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九三三年四月，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详细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内涵和现实依据，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较系统地介绍到我国。一九三六年，周扬又进一步发表《现实主义试论》，对于我国文艺工作者正确认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认识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在新时代的发展问题，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些未参加“左联”组织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这时也和“左